

金陵丛谈

胡允恭

金陵丛谈

胡允恭

人

金陵丛谈

金 陵 丛 谈

胡 允 恭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金 陵 丛 谈

JINLING CONGTAN

胡 允 恭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202,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500

书号 11001·748 定价 1.70 元

前 言

一、本回忆录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基本上按时间先后顺序而编排。

二、全书除附录外，其余均由周加才同志根据我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

三、本书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张宪文同志的认真校正，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由于本人年龄较大，而且时隔数十年，记忆中很可能有差错，祈望有关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胡允恭

一九八三年于南京大学

目 录

“五四”时期安徽的学生运动	1
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	10
关于黄埔军校和中山舰事件	24
北伐战争纪实	41
忆曹渊同志	59
夏斗寅叛变	66
马日事变真相	71
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	86
烟台工作回忆	89
忆薛沧海烈士	99
秋阳书店的前前后后	104
忆许继慎烈士	109
忆一九三一年山东学生反帝运动	119
忆孙一中同志	127
山东工作回忆	145
我和十九路军的一段关系	166
一个回忆	178
第二次被捕	182
忆姚第鸿同志	193

台湾二·二八起义真相	203
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	222
忆骆何民同志	229
忆朱蕴山前辈	238
附 录	
我和向警予大姐相处的日子	247

“五四”时期安徽的学生运动

一 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我小时候没读过正规小学，只是在家跟着秀才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数学略读一点，英文连字母也不认识。当时的中学是旧式中学，没有高中和初中。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差，同时没有外文和数学基础，因此不能上正规中学。

一九一八年，安徽省立第三蚕桑讲习所在宣城成立。根据讲习所的章程，一不需要懂外文；二不需要正规考试，而由本县主管教育的劝学所保送即可入学；三是除每年收七块钱的书籍费外，不收学费和膳费；四是两年毕业后可留蚕桑讲习所专门从事栽桑、养蚕，工资每月三十元。我得此机会，进入该所。其课程，除土壤学、栽桑、养蚕、缫丝外，其他均和旧式中学差不多。因为没有英文，所以一般课程我都能学懂。该校的教师多半是宣城人，但缫丝、养蚕的老师，几乎都是浙江人。开始我对这些老师的言语，几乎听不懂，半年后才慢慢习惯。因此，我安心读书，准备一生从事栽桑养蚕工作。

一九一九年，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安徽部分学生也跟着行动起来。当时，我们青年学生对为什么会爆发这场运动，什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是巴黎和会等等，都是茫然无知。幸好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也在宣城，校长是章伯钧先生。他当时年龄不大，还不到三十岁，思想比较进步。他请恽代英同志任语文教

师，代英在课堂中给大家穿插着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等问题。第四师范礼堂很大，本校学生还不到三百人，他们免费接受其他学校学生旁听。那时省立第八中学也在宣城，该校参加旁听的学生较多，蚕桑讲习所一共只有两个年级的学生。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参加了旁听。代英的讲话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同学们极感兴趣。他首先讲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的参战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他又讲了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分割殖民地的会议，而中国正是被他们分割的对象之一。因为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所以才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反对列强赞助日本侵略中国的运动，也可以说是反对北洋政府投降帝国主义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些内容都是我前所未闻的，因而感到十分新鲜。代英同志演讲了好多次，同学们很乐意听。他们本校学生以何世琨（现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同志为代表，联合了校外部分学生，又请代英同志继续讲些其他专题。他当时正在翻译《阶级斗争》，据他自己讲，英文不太好，翻译的东西多半要经其弟弟代贤拿英文本校正。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也还未出版。他介绍我们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杂志。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陈独秀是什么人，可是读了他的文章，对我们的思想大有启发。过了一段时期，他又介绍我们读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这本书就更难读了，虽然只有几万字，但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还是相当吃力。代英同志对我们说，这本书非读好不可，否则，就无法进一步读其他的书。所以，我每天下午，利用课余时间用毛笔抄写这本书，从头至尾抄了一遍，似乎稍懂了一些道理。

我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就是从听恽代英同志这些演讲开始的。在代英的影响下，安徽学生会组织很活跃。宣城县也不例外，学生会也很快组织起来了，并以第四师范学校为核心，何世琨同志

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蚕桑讲习所推举我和曹维为代表。

宣城是一个比较大的县，当年有五十万人口。比较繁华，商店很多。但当时店里所经营的象糖、火柴、棉布等日用品，几乎全是日本货。宣城的学生运动，起初还比较幼稚。除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号召，举行一些游行示威外，主要是反对日货。我们先是将查到的日货封存起来，后来也学别的地方烧日货。学生首先把自己用的日货包括洋布、洋伞、毛巾、洋皂等当众销毁。大街小巷以宣传抵制日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然后再到各商店搜查登记日货，禁止买卖。甚至把日本产的糖也撒到马路上。

一九一九年底，蚕桑讲习所的学生毕业了，原来所方说毕业后可以留下栽桑养蚕，而这时省教育厅突然宣布：这里要建立省立第六甲种农业学校。原来蚕桑所的学生，可以进入第六甲种农业学校，但原栽桑、养蚕的计划作废。同学们想想讲习所只有这么几间房子，又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的教师，值不得留恋。所以发了毕业证书后，绝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宣城。

一九二〇年，章伯钧到德国留学了，何世琨也从第四师范毕业了，恽代英经高语罕介绍，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去了。至此，宣城的学生运动便逐渐减色了。

二 安徽第二甲种农业学校 及全省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〇年初，我们从宣城蚕桑讲习所毕业后，许多有职业和家庭有钱的子女都不肯回家，而在芜湖组织了好几个补习社。专门请人教英文、补数学。我也很想在芜湖补习，但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钱交补习费和伙食费。幸亏我有一个本家老秀才胡建侯，他平时见我写旧诗，中文也还可以，所以对我印象很好。此

时，他在上海阜丰面粉厂做事，我便写信向他求援。我在信中说：“如果现在回家种田吧，以前的书就白读了；如果要再读下去，每个月要交八块钱做补习和伙食等费用。现在我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希望你代我设法。”胡建侯接信后，就跟阜丰面粉厂另一个本家胡歧山商量，他们二人同意每月共借给我八块钱。这样，我就进了芜湖补习社，开始补习数学和英文。负责教英文的是杨绍诚先生，教数学的是陶枕秋先生。我学数学不算吃力，可是英文得从字母ABCD读起。因为希望报考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这是芜湖有名的学校），所以读书非常用功。我们轮流烧饭、自己洗衣，专读英文，进步较快。本年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招生，我考取了。英文课本就是旧式中学的课本，我基本上看不懂，但当时还未开学，就买了一本英文课本，请杨先生先教我好几课。我起早带晚都背熟了，所以开学后遇到英文也不算吃力。在这个学校里虽然只要交膳费（每月三元）和书籍费，开支不算大，但到假期仍无钱回家，我就对杨先生说：“寒暑假你们学校工友都走了，反正我没钱回家，是不是就住你校（小学），帮你打扫卫生，挑挑水，顺便请你教教我英文。”杨先生慨然答应了。

在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我正式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当时芜湖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为翟宗文和马寅寿，曹渊、李坦、陶久仿、徐梦秋和我等都是学生会的成员。这时我们已多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学生会的同学又组织起来继续听恽代英和高语罕同志讲课，平时还阅读《向导》，这时逐步明确了帝国主义把中国看成一块肥肉，时刻想瓜分中国；而中国的每一个军阀为了保存实力、壮大自己，又无一不找靠山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因此人民群众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反对帝国主义就要反军阀，最终目标就是要改革整个社会。

除安徽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运动外，安徽教职员联合会也积

极支持和指导学生运动。例如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刘希平、教师高语罕和恽代英，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监（相当于现在的教导主任）王肖山先生，安徽公立职业学校住校董事朱蕴山先生以及李光炯（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史大化先生等，都是进步的前辈，他们都热心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我们在芜湖的学生运动主要宣传反帝和反北洋军阀，查封日货。当时北洋军阀驻芜湖的皖南镇守使旅长马联甲，非常反动。每逢节日，我们游行队伍走到他的衙门前，总要高喊“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北洋政府！”的口号。为此，马联甲对我们恨之入骨。

安徽学生运动联合会会长换了好几个，担任会长时间最长的是舒传贤同志。他年龄比我大六、七岁，是一位留日学生，在同学中威信最高。童汉章任副会长，许继慎任交际部部长。这时安徽全省稍大的县份中学都成立了教联和学联，声势日益壮大，并开始逐步形成统一行动、统一斗争目标。

一九二一年，安徽学联联合教员、工人、市民、商人赶走两任反动省长，是安徽“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高潮。当时安徽督军是倪道烺（段祺瑞嫡系），省长是许世英。倪道烺、马联甲为了扩充军费，他们想出了一种坏主意，一是要安徽省政府削减已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七十七万三千余元，二要实行盐斤加价制（即食盐按斤加价钱）。多收的钱交给他们作为军费。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就以此来唤起民众，开展反对倪、许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反对段祺瑞政府。斗争首先由教职员联合会发起，他们向群众宣传说，盐是人人要吃的，也是天天要吃的。搞盐斤加价，明明是要剥削全省三千万同胞。我们的宣传，鼓动了市民，激起广大群众对倪、许的不满。同时发宣言，打通电，公开反对倪道烺搞盐斤加价。这样，市民、小商、工人陆续组织起来，后来农民也参加了斗争行列，声势越来越大。省长许世英是段祺瑞的忠实走狗，但他是八面玲珑、四

面讨好的老政客。他一面对群众说，他不同意盐斤加价；另一面又去讨好倪道烺，说只有实行盐斤加价，才能解决军费。倪道烺说：“你既同意盐斤加价，现在就决定从某月某日开始执行。”教联会、学联会和其他团体得知这一消息，联络了各县千余名学生到安庆集会，并确定六月二日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前学生走街串巷，挨家逐户在居民门上贴条子，通知他们都要参加示威游行。六月二日一早，果真有很多市民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早晨七、八点钟游行队伍的声势已经很大。马联甲狗急跳墙，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伤五十多人。英山学生姜高琦和合肥学生周肇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牺牲，故被称之为“六·二”惨案。尽管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但由于组织得比较严密，游行队伍并未解散。随即向段祺瑞发通电，向全国学生发通电，得到全省和全国教联会、学联会的声援。

“六·二”惨案后，各地学生仍聚在安庆，继续坚持斗争，要求严惩凶手。六月三日，安庆各校一律罢课，各校校门悬挂着巨幅白布，上书着“议员、军阀，残杀学生，全体罢课，誓与偕亡！”学生们上街讲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安庆的教职员和商人捐款供学生吃饭。这时，六安“三农”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芜湖省立五中校长刘希平、学监高语罕，省法专校长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一女师校长徐皋浦，在省教育界工作的洪世奇等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有力地支援了学生的斗争。几天后，在安庆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追悼会，沉痛悼念在“六·二”惨案中遇害的同志。商人、教职员、学生纷纷送来挽联和花圈。许世英这个滑头也假惺惺地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道：

埋玉堪伤 回生无术知相谅

培材岂易 劝学初衷咎独生

许继慎同志是学联会的交际部长，他把许世英送来的挽联倒

挂在礼堂里。马联甲看许世英送挽联，他也送了一副，上面写道：

陈太学为国捐躯 死而无悔

来君叔何人所杀 我欲问天

“六·二”惨案明明是他一手制造的，而他却还一本正经地说这是过激分子的行动。许继慎同志越看越气愤，就在马联甲送的挽联上大批“放屁”二字，叫马的士兵带回去了。

追悼会后，学生仍坚持斗争。事态愈来愈大，段祺瑞不得已才把许世英撤换，安徽的学生运动也暂告停顿。

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又派李兆珍任安徽省长。李兆珍比许世英更坏，他和倪道烺勾结得更紧。李兆珍上任后，学联会提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倪道烺、马联甲叫李兆珍不要理睬学生。李便对学生说：“目前经费困难，一分钱也不能增加。”对此，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又在安庆开会。主要是准备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姜高琦两烈士墓被破坏的问题（原来两位烈士墓是建在安庆市北边的高山上，还专门立了纪念碑。现在墓被挖了，碑被打碎了）。二是要派人去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告状，要求撤换李兆珍。另外，教职员联合会还派了光升（安徽桐城文学大家，吴佩孚曾想聘他任秘书长）去找吴佩孚，想通过直系军阀赶走倪道烺、马联甲，均未获成功。

一九二一年秋，学生联合会又发起反对李兆珍的斗争。某天，以学生为主，联合了工人、教师、商人等几千人举行示威大游行。李听到消息，吓得关上了铁门，并派卫兵把守。游行群众用棍棒、砖头和石块砸门，许继慎等同志带头爬墙。因为示威群众已把李兆珍住宅围得水泄不通，所以守卫的士兵也不敢开枪。当学生冲进大门后，怎么也找不到李兆珍，原来李不知什么时候已逃走了。后再也未在安徽政界出过面，就这样又赶走了一个省长。

三 安徽学生界和教职员联合会的分化

赶走两任省长，轰动全安徽，也震惊了不少军阀，因而遭到军阀们的咒骂。他们恶毒地咒骂学生是“丘九”（因传说“丘八”不讲理，军阀污蔑学生也不讲理，故谓之“丘九”）。尽管学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终因力量悬殊，没有能赶走倪道烺和马联甲，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因而学生内部思想十分混乱，议论纷纷。以徐梦秋（安徽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生）、薛卓汉（二农学生、在上海加入青年团）为首的一部分学生主张组织一个团体，后来起名为“爱社”，是半秘密的。基本队伍有数十社员，因为多半是地主出身的少爷、小姐（徐梦秋本人并不是地主出身），故有人称之为“小姐少爷社”。此时，陈绍禹、李竹声都已转到安徽第一师范读书，他们也是“爱社”成员。曹渊、许继慎、杨溥泉和我等人与他们合不来，便商量准备组织“铁血团”。这主要是受了胡适《努力》周刊的影响，胡适曾鼓吹“干，干，干！手枪与炸弹。”我们幼稚的认为要干，没有手枪和炸弹当然不行，因而想买手枪搞暗杀，认为杀掉一个坏蛋少一个。后在恽代英同志演讲和《新青年》杂志的启发下，我们认识到光靠手枪和炸弹还不能革命，因此“铁血团”未筹建起来就停止了。

“爱社”那部分人，则认为没有学问不能革命，便主张出国留学。结果，他们中大部分人经高语罕介绍去苏留学。

在我们原准备组织“铁血团”的这部分人中，因有的人曾讥讽过“爱社”，所以“爱社”成员和我们结下了怨仇。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不少同志意识到没有武力不能革命，想搞枪又搞不到，所以决定去广东，进了黄埔军校。例如杨溥泉、曹渊、许继慎等，其中不少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献身，成为革命烈士。

教职员联合会也发生了分化。芜湖第五中学校长刘希平因为在进步青年和群众中，声望很大，所以成了北洋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其采取恐吓、威胁等种种手段，使他不得不离开第五中学。当时该校有不少学生也不愿继续在第五中学读书。刘希平就把一百多名学生从芜湖带到南京，在成贤街办了一所新民中学，并得到陶行知先生的全力支持。其教师基本上都是东南大学和陶行知先生供给的。刘在新民中学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办得很有特色，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中国进步文学家蒋光慈（左联成员）就是该校学生之一。进黄埔及投奔革命的学生也不少。刘希平先生逝世后，新民中学就停办了，安徽省教职员联合会把他的灵柩运回芜湖，在赭山为其筑了墓，立了碑。

由于北洋军阀的镇压，进步人士在安徽已呆不下去，而被迫纷纷离开。朱蕴山先生离开安徽接近国民党（左派）和陈独秀；高语罕则去德国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和邓演达先生相处极好。所以他从德国一回来，邓演达就派其做黄埔军校主任教官；恽代英也在这时到上海大学任教去了。

当然，教职员联合会中也有少数人屈服于压力，放弃了革命，甚至投降了敌人。就这样，教职员联合会也分化了。

虽然轰轰烈烈的安徽“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被北洋军阀镇压下去了，但她唤醒了民众，点燃了革命火种，为革命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以至今安徽广大人民还记忆着当年的教联会、学联会。

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

一

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创立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它的前身是私立上海文科专门学校。校址在闸北青云路(即今西宝兴路)青云里,校舍是一个二层楼的破旧小房子,因陋就简,略加整理就变成学校了。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校舍紧张,所以教师和学生多半住在校外。

上大的创办,正值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际。培训革命理论人才和建立革命新军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加强上海大学,创办黄埔军校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充实上海大学,我党派了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到上大,邓中夏任教务长,其他人任教授,给上海大学注入了革命的新鲜血液,使之面貌焕然一新。

国民党派于右任为上大校长。于右任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运动,手创西北军,杨虎城、胡景翼等都是他的旧部,当时颇有声望。派邵仲辉(即邵力子)任总务长。由于于右任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校务时常由邵仲辉代理。当时上大主要有三个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何世桢;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另有美术系,只办了一段时间就停办了。

一九二三年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上大巍

然独立于黄浦江边，学生人数猛增，校舍愈感拥挤，遂于次年二月间迁址到公共租界西摩路（现陕西北路）一百三十二号。迁校后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规模更大。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帝国主义惊恐万状，强行封闭上海大学。经过上大师生顽强的斗争，于一九二六年在江湾又建新校舍。

由于上大师生一直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因此成了由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的“眼中钉”。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北伐军到了上海，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突然派兵进驻江湾新校址。上大不少学生被捕，财产被抢劫一空。上大由此而被迫关闭停办。

二

上大从创办到封闭，充满着内部矛盾和斗争。上大的学生，从政治上看可分为两大派。多数人是要求进步的，他们中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倾向共产党的，一部分虽倾向国民党，但那时国民党的主体也是革命的。所以这两部分学生均属于革命派。少数派则是以何世桢、何世枚、凌铁庵、凌焦庵（安徽定远人）这两家的子弟或亲属为主，加上受他们影响较深的一些青年。

上大学生进校前，有不少同学就已形成独立的政治见解。虽然学生进校时，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数甚少。但他们中一部分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上已渴求革命；还有一部分是在全国各地参加过如火如荼的实际斗争，而受反动当局开除学籍或受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逃到上海，进入上大的。所以，他们一般思想比较进步，加上进校后受到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安存真等的马列主义教育，进步更快。不久，党团组织迅速发展，人数与日俱增。当时上大发展党员，主要看其家庭出身；看其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